

论唯物史观视域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

贾丽民 宋叶恒

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理论,客观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运用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探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维由何而来、内涵几何的科学视角,更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理论指引。

历史发展的必然与人的主体选择: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之维的历史由来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和人类文明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1. 人类文明发展与中华民族自觉选择决定“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面对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中华民族以“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坚定信念竭力探求文明延续的出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团结领导各族人民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既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又积极主动作为,以历史主体的主人翁精神在接续奋斗中成功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更新的结果”,“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2. 世界历史发展决定“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唯物史观认为,大工业的发展“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且“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人类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每一种文明都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都是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图谱中不可或缺的板块。同时,人类社会也在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实现了“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的进步转变。在人类文明的七彩画卷中,中华文明不仅在现代转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开创人类现代化发展新途径,更在现代文明的建设发展中,为解决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文明、生态等方面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之维的内涵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

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存在为基础的。”

1. 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意识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文明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既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及其产物,内含着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一意义上与文明相通,是社会存在的科学映射,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攻坚克难、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撑,更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化根脉。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的发展和发展中的继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2. 发挥社会意识反作用而“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明

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先进的社会意识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反之亦然。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工业革命率先实现现代转型,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难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了。而“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而非追求资本增殖的,坚持为人民服务而非为资本家服务的,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谱写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篇章的文明,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

3. 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家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本质上都是镇压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而“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

的障碍,同时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阻碍”。且现代文明的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力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更是立足全人类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求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

社会发展动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之维的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社会发展动力原理“为我们分析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1.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发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对此,一要把握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坚持中国立场和自我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结合新时代的新条件与时俱进赓续中华文脉。二要坚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内化革故鼎新和无畏品格,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促进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要激活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强化内向凝聚和契合交融,大力推进“五个认同”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四要聚焦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又善于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五要凸显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以“天下大同”的世界格局和“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不断涵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2. 立足“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激发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

唯物史观强调,历史发展是“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且“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换言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不仅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更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因此,一方面,必须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中央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领导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3. 运用“两个结合”这一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以指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政党的优势就在于“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扭住“两个结合”这一着力点。一方面,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要赓续中华文明历史文脉,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当代华章,“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落到实处。

【作者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本文为天津社科重大项目(TJESDZX22-04)、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计划项目(A231006502)阶段性成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意蕴

耿凡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了其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性。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对我们在新征程上把稳前进方向、科学谋划未来具有重要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观意蕴

人类自开始使用工具从事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以来,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在生产、再生产、人口的生产、社会意识的生产、意识的生产之间相互交织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是线性的,而是蕴含着偶然性与曲折性的复杂过程,是包含自由与必然、目的与手段、本质与现象辩证运动的结果。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虽然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资本主义不会自行消亡,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机器、经济手段、意识形态等一切方式打压、排挤、束缚无产阶级,以达到维护阶级利益、捍卫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结构的目的。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描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实践、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低谷与复兴,记录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艰苦斗争过程,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相较于资本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西方文明形态无法比拟的显著优势:坚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克服了西方金钱政治、集团政治、决策效率低下的弊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克服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克服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消极腐败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克服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发展模式。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使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相继取得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开创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新模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意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文明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开创出来的,蕴含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紧紧依靠人民共同奋斗,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切都昭示了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这是我们创造出和将继续创造出更多更优人类文明新成就的关键所在。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它以前的社会形态中,人们总是处于社会性的对抗中。一是人与自然的对抗,表现为人们从慑服于自然到逐渐控制自然的历史过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压迫与对抗。三是人与自身的对抗,表现为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人的社会性对抗;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矛盾,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身的异化关系得以消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彰显。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论意蕴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在人民层面,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想方设法增加人民收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在民族层面,一体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逐渐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层面,充分发挥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效规避“文明冲突论”陷阱,为世界各国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地球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一。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文明的进步必然会带来道德的退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这反映出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历史逻辑侧重于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价值逻辑则侧重于强调“应当”,它在人们的观念世界建立起完善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目标。不同的内在逻辑导致了历史与价值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协调。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也导致无产阶级走向异化的深渊。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人民与国家、个人与集体形成了内在统一关系,人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引领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将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有机融合起来,汇聚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赋能海洋碳汇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刘秋妹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我国于2020年提出了基于提升国家自主贡献度的“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彰显了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责任感,是我国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全人类共同家园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海洋作为重要的碳汇库,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显著生态价值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天津是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推动海洋碳汇活动的制度化,探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提升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推动海洋碳汇发展,是达成“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海洋碳汇,又被称为“蓝色碳汇”(简称“蓝碳”),是指通过海洋生物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封于海洋环境之中的过程和机制。海洋在地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球上约93%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并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循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形势仍旧严峻,各国均面临着一定的减排压力。在这一背景下,海洋在碳吸收和固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凸显。《京都议定书》将“减排”和“增汇”作为控制温室气体存量的两大路径。其中,“减排”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的源头削减,“增汇”是借由森林、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实现对温室气体的捕获和封存。“双碳”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源”控制,还需要打通生物碳储存的“汇”路径。海洋是碳汇的重要载体。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指出,要稳定海洋固碳作用,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海洋碳汇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碳封存方式,能够通过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有效地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其极强的生态固碳能力为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突破口。

二、充分挖掘区位优势,是发挥海洋碳汇价值的着力点

积极稳妥推进国家“双碳”工作,需要结合地方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制订实施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类型碳汇资源的价值。我国是海洋大国,但海洋资源分布并不均衡。天津地处环渤海经济区,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肩负减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实施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作为沿海城市的天津,滩涂面积十分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水平很高,海洋资源储备丰富,具有优越的海洋资源禀赋。突出的海洋资源优势,是天津开展海洋碳汇活动的自然条件。此外,天津是最先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城市之一,多年来在碳市场金融化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开展海洋碳汇交易的制度基础。天津应积极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一方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大力修复包括滨海盐沼、牡蛎礁以及生态海底在内的各类海洋生态系统,维持并不断提高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和埋藏能力;另一方面着力推

动生态补偿等制度创新,打造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平台、新机制,为“蓝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持续优化海洋碳汇交易制度,是实现“双碳”愿景的助推器

海洋碳汇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而发生的碳吸纳和固化过程。海洋碳汇交易是以滨海盐沼、红树林等滨海蓝碳生态项目具有的吸纳、固碳潜力为对象的交易活动。充分发挥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作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举措落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海洋碳汇交易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进一步优化地方立法,推动海洋碳汇交易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运行。充分发挥政府对海洋碳汇交易活动的引导作用,为交易主体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建议结合《天津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修改《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立法,确立海洋碳汇交易制度的法律地位;适时出台《天津市海洋碳汇管理条例》,明确海洋碳汇交易过程中的各项要素,即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平台、监管机构等,科学设定各类主体的法律责任及海洋碳汇交易纠纷解决机制。

第二,建立海洋碳汇科技评估体系,为海洋碳汇交易活动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持。作为我国首个综合性海洋碳汇核算标准,自然资源部2022年批准发布的《海洋碳汇核算方法》行业标准已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为海洋碳汇的概念界定和量化提供了规范指引。虽然海洋拥有巨大的碳汇潜能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但目前在海洋碳汇的蓄积量、吸收及固化速率、碳汇效果的评定等方面尚缺乏一套系统的技术指标。可借鉴森林等生态系统碳汇评估体系,结合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设计海洋生态系统碳汇核算体系和评估指标,为海洋碳汇交易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第三,将海洋碳汇纳入绿色金融体系,畅通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市场化路径。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海洋碳汇纳入碳交易制度框架之中,是将金融工具引入碳市场的创新尝试,是绿色金融理念与发展蓝色经济战略的有机融合。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接受海洋碳汇项目在固碳、减碳方面的预期收益作为担保物,为碳汇项目提供贷款优惠等融资服务,既可拓宽项目的资金来源,又能促进海洋碳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市场化。

我国是气候治理的积极践行者,而海洋是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领域。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构建科学合理的海洋碳汇制度,能够全方位发挥海洋生态系统的资源价值、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略海洋指示的重要途径,对于建设海洋强国、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海洋碳汇交易的制度化除了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以外,还需要不断吸纳企业、公众的参与。相信随着海洋碳汇交易活动的进一步规范化,海洋碳汇这一蓝碳工具对于实现“双碳”目标的推动作用将得以有效发挥。(作者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讲师)